

September 2018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Func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Shuzhuo Jiang

Shi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Jiang, Shuzhuo, and Shi Li. 2018.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Func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5): pp.6-1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5/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价值分化与价值重构

——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功能与价值取向

蒋述卓 李 石

摘 要:当前文艺批评的缺席、失语、弱化等问题,不只跟市场化以及西方理论的强势影响有关,而且根源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分化。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对文艺批评的相关论述,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构建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功能应该落实到人民大众的审美素质的提高以及现代人格的养成。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一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二是要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传统有坚定自信,三是要坚持审美性原则。

关键词:新时代文艺批评; 价值取向; 文艺工作座谈会; 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蒋述卓,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学与文化关系、文化产业等方向研究。电子邮箱: tjsz@jnu.edu.cn 李石,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电子邮箱: stoneli2014@126.com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暨南大学第二文科楼 811, 邮政编码: 510632。本文为 2018 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习近平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8GZWTZD06]。

Title: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Funct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Abstract: The absence, aphasia and weakening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marketization and western theories, but also rooted in value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Xi Jinping's series of speeches on literary and art work have provided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of constructing value of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should function to improve people's aesthetic quality and cultivate modern personality.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riticism shall be people-oriented, firmly confident in China's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aesthetics.

Key words: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value orientation; literary work symposium; cultural confidence

Author: Jiang Shuzhuo, Ph. D., is a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Ji'nan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ry and culture, cultural industry, etc. Email: tjsz@jnu.edu.cn

Li Shi is a Ph. D. candidate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Ji'nan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stoneli2014@126.com Address: Room 811, the Second Liberal Arts Building, Ji'nan University, 601 West Huangpu Ave.,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510632. This paper is funded by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roject of Guangzhou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2018(2018GZWTZD0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围绕着文艺批评所产生的各种讨论与争议层出不穷,批评的失语、批评的无效、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孱弱、批评的泡沫化等问

题被纷纷指出。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在 2014 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不能都是表

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9),进一步精准地揭示出文艺批评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后如何改变的方向。

在新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对“文艺批评”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批判和反思了。文艺批评所存在的毛病,追其原因,既涉及到市场化之后文艺批评沦为市场附庸的问题,也涉及到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对中国文论的强势影响的问题。但需要警惕的是,对“文艺批评”的批评不能简单地诉诸二元对立的、非理性的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从学术的角度,任何道德主义和道德热情不仅无助于新的学术话语的形成,甚至一定程度会阻碍学理构建的步伐。只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与立场出发,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从文艺批评如何改变当代文艺的命运走向和话语困境入手,我们才能够立足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对文艺批评的话语建构提供真正富有学理价值的思考。

一

我们认为,文艺批评目前存在的问题,确实跟文艺的市场化有关,但市场化并不是导致文艺批评话语效力减弱的根本原因。从现代性层面而言,文艺批评话语的弱化,牵涉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分化和价值的分化。有趣的是,文艺批评在特定时期又成为社会分化、价值分化的促进性力量。而这,就是文艺批评所面临的悖论与困境。

第一,文艺市场机制的形成导致文艺批评的弱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我国社会的分化,而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专业化、职业化趋势的形成。在文学生产领域,专业化趋势一方面带来文学理论的学科化和体系化,这一度被认为是学科自主性形成的标志,但是文学理论的学科化客观上又造成了与文学创作现实的割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联系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文学市场机制的形成,也弱化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联系。文学市场大体是由生产、传播、接受、评价构成的流通过程,因此也是一个由创作者、受众、批评家、媒体、书商、政府管

理者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公共领域。在“十七年”时期,文学的生产组织方式在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方面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特征,这种一体化特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在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方法等方面的趋同倾向”(洪子诚 188)。这种趋同倾向,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创作潮流中,尽管创作观念存在区别,但是在表达民族文化母题和时代精神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传统文学生产机制中,文学期刊编辑对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和制约关系,甚至很大程度上,文学编辑跟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是重合的。但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紧密联系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转型中迎来了转折。市场运行机制催生了新的发展格局,特别是通俗类的大众文学读物的畅销,以及21世纪以来网络文学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导致传统文学编辑和文学批评的权力越来越退守到学院批评、专业批评的领域,也因此导致文学批评对大众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

在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中,传统的文学批评话语的主体地位被稀释,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权力关系被解体和分化。文学批评不再像以往那样居于文学生产的话语中心,而只是参与到文学生产的一个角色、一个环节,由此也就失去了以往对文学创作的支配力;与此同时,随着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形成,文学批评也逐渐区分出不同的层次。高建平先生指出当前主要存在着三种批评,一是推介性批评,即新的作品出版后由出版社组织批评名家撰写文章讨论和推介作品,二是扶植性批评,即相关文艺组织或教育培训机构对小群体的文艺创作者进行关注和扶持,三是以新媒体为主要载体,为获取关注与轰动效应而流行的“酷评”。^①在高建平先生看来,从事这三种批评的尽管有很多来自于学院研究机构,但是支配着他们的立场和话语的往往是非学院的逻辑,也就是媒体和市场的逻辑,从而难以保持学术评价上的独立品格。因此,高建平先生认为还应该存在着独立于以上三种批评的“学院派”批评。这种区分提醒了我们,当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批评不是单一的,有不同的层次。但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划分方式也存在着将学院批评与其他批评对立起来的倾向。我们认为当前文学批评可以分为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三个层次,而专业批评也

是可以保持自身的学术品格和立场的。与学院派批评更倾向理论的自足建构不同,专业化批评相对更为灵活,它既保持专业性同时又注重话语的灵动性,它关注文学热点现象但是不追赶热点,力图对文学作品与现象提供自身的独立思考。由此,专业批评也就区别于追逐和迎合市场的媒介批评。^②事实上,文学批评力量的弱化,其问题实质很大程度与媒体批评力量占据话语中心,而学院批评和专业批评被边缘化密切相关。

第二,理论的分化造成批评的泛化。理论的分化是现代性分化的结果。^③在前现代的社会,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都发现存在着某种“形而上”的牵制力,也就是存在着一种不因时空变化而改变的稳固的价值系统,而价值系统的稳固性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着理论的牵制力。在西方历史上,人们对“理念”“上帝”“物自体”的形而上构建,就是试图构建某种永恒的、普遍的道德基础。在诗学层面,从文艺复兴到法国新古典主义时期围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产生的种种阐释和论争,证明西方古典文艺理论史同样具有创建一种永恒的、普遍的诗学体系与创作法则的执著追求。在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奠基性著作,就是以“原道”“征圣”“宗经”开篇,天地之道、圣人之言、四书五经,成为后世作文的普遍遵循。所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3)。当然,从文艺创作与批评的角度,《文心雕龙》对中国古代诗文创作的的影响力,未必有如亚氏之《诗学》对于西方古典文论那样的支配力。但原道、征圣、宗经的观念,确实潜移默化地渗透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之中,构成中国文学观念的一种永恒的价值坐标乃至等级秩序。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纷纷遭到质疑和解体。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遭到质疑和解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一直到19世纪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才宣告西方形而上传统的终结。随着后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提出,到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则彻底开启了价值分化与理论分化的时代。理论分化的结果是批评的泛化。这方面,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开端,它摒弃了德国古典经院式哲学的思辨传统,转而接续了经验主义的思维观念,逐

渐开启了对现实政治、世俗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热情关注。由此,批评成为一种话语权力,政治批评、哲学批评、美学批评、历史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等,不断释放着话语空间被掘开之后的巨大思想能量。这一转变,也成为后来“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研究范式转化的重要契机。上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潮流在国内兴起,带来了西方大量的文化和文学理论,这些理论直接“侵入”到文艺批评领域,从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到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权力批评、女性主义批评、跨文化批评、媒介批评等等。对文化批评各种方法的借用,让人们真切体会到思想的、理论的、话语的力量,但是也逐渐显示出理论分化之后话语的泛滥。人们逐渐意识到,批评的泛化并非批评繁荣的标志,而是批评泡沫化的征兆,是理论过剩的危机。

第三,与批评泛化伴随而生的,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文学家族不断扩大,导致文艺批评对象的“失焦”。20世纪以来,报纸、杂志、出版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古典文学的生产机制和发展环境,对中国文学的思想观念、语体文风、审美形态、流派社团、经典形成、传播接受和批评论争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至20世纪末,影视、广播、网络等媒介迭代所带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再一次重构了文化和文学的新格局和新形态。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正是通过不断地将自身与新的物质、技术和表征方式进行连接和融合,获得新的存在方式,生成新的艺术媒介,扩展新的文学生态,彰显文学性的活力与潜能;另一方面,由于当下电子媒介的发达,视觉形象的凸显,传统的文学观念受到当代媒介文化的强烈冲击与侵袭。新的媒介技术和表征方式的出现,导致文学家族的扩大,文学丧失了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而“文学性”则溢出了文学的边界,不断延伸、变异、泛化,并渗透到大众世俗的文化生活之中。文学家族的扩大,最明显地体现在网络文艺、影视动漫、流行歌词、综艺选秀等流行文艺,以及广告传媒、主题公园、时装表演、商品包装、广场文化等泛文艺现象上。这既导致90年代以来“文学终结”的悲观论调的出现,也使得文艺批评者在文艺泛化的趋

势面前有点手足无措。面对日新月异的文化和文艺现实,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什么样的理论去应对和解释?这个复杂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欧梵、王德威等华人学者借鉴西方文化的公共空间概念,以现代性视野开辟了对晚清以来的文学与文化生态的研究空间,开启了人们对晚清乃至五四时期的文学和媒介互动研究的新场域。^④受此影响,对五四时期的旧报章、杂志、期刊等丰富史料的挖掘和阐释,一度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向。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这是否也是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文化生态和大众媒介的潜意识拒绝和回避,而退守到对报章、杂志、社团等相关文献史料的挖掘和考证,以及对五·四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守护之中?毋庸置疑,面对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知识分子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和价值立场去介入,这曾经是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但真正核心的问题或许是,面对巨量的泛文学文本,文艺批评应该如何重新认知和聚焦,如何调整自身的价值立场并重构自身的批评话语方式?

二

文艺批评面临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分化和价值分化的必然结果。那么反过来说,社会价值的重构,或许正好应该成为重新界定文艺批评的功能和价值的重要契机。习近平强调:“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9)。这无疑从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文艺批评与受众的关系、文艺批评与时代风气的关系等层面的逻辑递进,逐步界定了新时代文艺批评的引领功能。文艺批评的功能一定程度是由文艺创作的功能所决定的。在文艺创作上,习近平从时代精神的高度,肯定了文艺的政治功能,揭示出“社会实践-文化创新-文艺创造”的逻辑演进关系。因此,文艺创作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涉及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的文艺灵魂等宏大的文艺母题与民族文化命题。事实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融合,回归的正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以载道”的传统。如果说“道”代表着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中的主流思想观念和精神价值,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代表着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形成,既需要经过一段历史发展过程,同时还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涵养,最终通过强化教育引导、文艺创作的生产和传播使之逐渐融入社会发展的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而这,正应成为新时代文艺批评功能的价值基础。

从西方的文艺批评传统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文艺批评话语的形成必定包含着批评者本身的价值立场。从历史看,柏拉图和尼采,可以说是西方文化转折的两个关键人物。柏拉图和尼采分别以《理想国》和《悲剧的诞生》对西方文化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先说柏拉图的《理想国》,这部著作在历史上留给人们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对诗人的批判。^⑤其中原因,我们在《理想国》以及许多西方美学史、西方文艺理论史、比较诗学等著作中能找到很多解释,比如“诗人败坏道德”“诗人唤起人们的哀怜癖,软化人们的情感”“诗人摹仿虚假的事物”等,但究其实质,柏拉图批评诗人荷马,其实是意图撼动诗人在古希腊城邦中的统治地位,他是在批判一种由诗性思维建构起来的社会传统和习俗,试图以哲学思维取代诗性思维。柏拉图的文艺批评服务于其哲学理念,他质疑诗和艺术,本质是在批评荷马神学时代建构起来的“英雄人格”,因为荷马史诗里的那些英雄尽管有着伟大的人格,但是在很多方面的行为上,是不“善”的,是邪恶的。也就是说,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批评,指向着更为理性的、文明的、善的人格追求。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在18世纪,尼采又反过来重新对柏拉图主义进行了价值评估,并重新呼唤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格,他在《悲剧的诞生》里批评了柏拉图主义对诗人的批评,认为柏拉图主义对理性的过分强调,本质上是以一种禁欲式的道德压抑了欧洲的艺术精神,促使悲剧的消亡。“如果说古老悲剧被辩证的知识冲动和科学乐观主义挤出了它的轨道,那么,从这一事实可以推知,在理论世界观与悲剧世界观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只有当科学精神被引导到了它的界限,

它所自命的普遍有效性被这界限证明也已破产,然后才能指望悲剧的再生”(尼采 153)。事实上,尼采的悲剧理论,同样是他的超人哲学的产物,所谓超人哲学,就包含着对荷马史诗那些富有强力意志的英雄人格的呼唤。从辩证角度看,尼采的艺术美学思想对人性的身体、欲望、本能的重视,某种程度也蕴含着极端的破坏性,比如他承认英雄人格凭借自身的强力,具有任意掳掠和奴役的合法性,这与现代文明精神是明显相悖的,但是也要看到,尼采的艺术美学思想也包含着对宗教集权、思想禁锢的批判,对人性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肯定。

也就是说,尽管柏拉图和尼采的文艺批评话语,不管从态度、立场还是观点上都是截然对立的,但他们都以个人化的话语批评方式,提出各自的艺术美学观念,而且他们的批评话语,最终的价值指向都是人格的形成。

中国古代的儒家文论,同样正视文艺对人格养成的作用。在儒家文论中,文艺批评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在这点上与西方传统明显不同),而是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于文艺的功能,孔子在《论语》中有两个概括,一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张燕婴 88);二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09)。其中“艺”和“乐”都指的是艺术,也就是用艺术来塑造人的情感。这样,艺术既成为人格修身的终点,也是社会发展的终点。

上述柏拉图和尼采的例子,说明价值重构是可能的,前提是必须立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及辩证性的合理论证。而儒家文论作为一种久远的传统,必然要参与社会价值构建的过程。由此,我们反观文艺批评在“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方面的重要功能,这既是确立新时代文艺批评功能的核心要点,同时这一功能又深刻地联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求文艺创作服务于社会的要求、政治的要求,比如延安时期的文艺服务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时期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新时代文艺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其实质则是要求文艺成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而且客观上,不管是五·四时期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现当代文艺创作、理论、批评,也确实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的解放的重要

力量。这也说明,受儒家传统文论的影响,文艺无法完全脱离政治也不可能脱离政治。新时代文艺批评的政治功能,不仅仅体现于引领社会变革与时代潮流,而应最终落实到现代文明素质的养成以及人格的提升。而这也成为我们思考新时代文艺批评的价值取向的根本基础。

三

新时代文艺批评功能及价值取向的确立,不应忽视时代多元的文化生态和语境。但是,当前文艺创作越是呈现出多元的、不断泛化的延伸趋势,文艺批评就越应该把握好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从历史看,真善美的、健康的、高尚的文化,既是人类主流的文化追求,也应成为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因此,新时代文艺批评应该把握好三个价值取向:

一、新时代文艺批评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根本立场,也是新时代文艺批评的首要标准。“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4)。当然,以人民为中心,不只是文艺领域的价值标准,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根本立足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充分激发人民的创造热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胜”4)。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归根到底,就是既要让人民充分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果,这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根本的生存、发展的权利;同时又要不断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充分享有审美的权利。而审美,最终指向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现代人格的培养。

文化事业的一切目的,最终都将沉淀为品格。前文谈到,柏拉图的文艺批评所依附的哲学思想,试图通过批评荷马神学中的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呼吁人们超越个体感性,上升到政治的、集体

的、理性的层面思考问题。但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的演进,某种程度正是不断摆脱这种集体理性的束缚,而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所包含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个体意识,正参与和促进了这一观念演变的历史,成为后来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先驱。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整体上可以说是个体权利不断被肯定的过程。但也要注意,个体意识的极度膨胀和张扬,也容易带来巨大的颠覆性和破坏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更多体现为一种整体人伦,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关系,即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充分说明,个体权利的保障往往要放置在国家社会的整体进步中才成为可能。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置于首位,是因为国家富强、民族兴旺,才有人民安居乐业与全面发展。

在此基础上,新时代文艺批评要关注的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格建设,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与处境,肯定人在社会中拥有各自独立的存在价值以及追求公平、公正的自由权利。在文艺创作上,就具体体现在如何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创造,通过文艺的启蒙、接受、教育以促进人的审美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就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审美的方案。新时代文艺精神的创造与勃发,必然指向着人的审美素质的提高。新时代文艺批评应以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作为根本目标,要正视当前人民大众审美趣味越来越多元化的现实,充分尊重和肯定人民大众拥有审美选择的权利,但是对于一些刻意迎合大众低级趣味、价值观混乱、盲目追求市场利益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和现象,文艺批评必须发挥价值引导的作用,对文艺低俗现象进行批判。与此同时,文艺批评更应以理性的话语启蒙、专业的审美分析、批评、判断来引导大众。

二、新时代文艺批评要有对中国历史及文化传统的自信。文化自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从历史维度看,文化自信又与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过程中的心态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过去曾取得的辉煌和优越地位,受到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和冲击。强国地位的失落也就是文化尊严的失落,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似乎总是处在一种“差人一等”的地位。西

方社会借助于工业化生产所获得的经济水平与物质繁荣,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观念,西方文明对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的重视等,似乎都使得中华文明“相形见绌”。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尽管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和介绍使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但“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也成为当时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比如钱玄同就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欲废孔子,不可不先废汉字”,“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722)。胡适也指出:“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刘梦溪 59)。这种主张背后,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对西方文明的艳羡与崇拜。五·四时期的各种文化论战,基本上是围绕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而产生的,甚至在当时,排斥和贬低中国传统文化,要全盘学习、借鉴、追随西方文化的观念占了上风。这一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期间再次出现,产生了跟随西方、以西方为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甚至出现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声音,不认为“落后”的传统文化具有适应现代化的能力。从辩证的角度看,不管是五·四时期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时期,都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观察世界、接触世界,并与世界相融汇的重要历史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自卑或过度自负,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或盲目崇拜,归根到底都是对自身文化不自觉和不自信导致的。体现在理论批评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学界引发的“文论失语症”的讨论到近年来“强制阐释”相关话题的论争,就对我们的理论不自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新时代文艺批评首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文化自信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于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表述。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新时代文艺批评要对传统文化的创造力具有无比的自信,才能真正理解文艺创新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自觉、自信地立足中华文化传统,在批

评实践中更多关注那些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作品,引导文艺创作者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来创作,推动中国文艺的创新。其次,新时代文艺批评要重视挖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积极与古代文论进行对话,在当代文艺批评话语实践中推动古典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9),涉及到文艺批评如何正确地借鉴西方理论,一方面要避免把西方理论提高到非历史的高度,盲目套用西方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现象;另一方面,要充分注意到我们本就拥有悠久的中华美学传统。“中国古代文论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其相反相成的哲学思维、顿悟式的诗性思维和感物传统,以及‘中和’‘气韵’‘意境’‘物化’等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较为完整的理论命题和范畴体系”(蒋述卓 13)。如何立足于这些理论资源,对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是新时代文艺批评的重要方向。再次,新时代文艺批评要对历史有正确的认知和运用。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是变化的历史、流动的历史,而不是僵化的历史、凝固的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文化创造力,也就会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艺历史星河感到无比自信与自豪。“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只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我们才会充分理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历史语境和历史意义。文艺批评要对文艺创作中扭曲历史、抛弃历史、背叛历史、颠覆历史、调侃崇高、扭曲经典、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等现象进行批判,引导文艺创作、引导人民大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三、新时代文艺批评要坚持审美性原则。当前文艺批评的失焦,跟新的媒介技术导致文学性的扩张和文本的泛化密不可分。而文本的泛化和批评的泛化正是当前文艺批评需要面对的重要症候。事实上,文艺的发展正是在媒介传播方式的演变中不断地生成新的叙事方式、话语风格与审美特征,但是以往的文艺批评却对这方面的阐释不足。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某种程度是

对形式主义过分注重文学内部批评的一种反拨,试图挣脱以往文学研究的封闭式的文本阐释方式,以重构文学文本与现实的政治、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肇始了文化批评的泛化。文化批评对探讨文化与权力关系的热切及其强烈的政治旨趣,往往使得文学性和审美性受到遮蔽和隐匿。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文艺作品或创作者与社会文化、政治遭遇、意识形态等层面的互动关系,其重要弊端就在于忽视了文艺作品的艺术美学价值,搁置了对文艺创作优劣的判断。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习近平为何强调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9)。事实上,以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进行文学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批评标准。而习近平在这两个标准之外,创造性地增加了人民的、艺术的这两个标准,可以说正是充分重视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中的艺术性、审美性因素。事实上,文艺批评的审美性问题的确在90年代以来的文艺学界也产生过许多论争。我们无法否认,西方文化理论与方法的译介和传播,确实为文艺批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和阐释力度,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批评的审美性维度缺失的问题。而国内“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出,某种程度上要克服的就是文化研究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关系上的割裂,试图在西方文化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更多结合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的诗性性的、顿悟式的文艺批评方式,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确立和开掘新的审美维度和审美意义。不仅仅是文艺批评,中国当代文艺市场尤其是影视市场的繁荣背后,也无法掩盖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严重缺失、有高原没高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优秀文艺作品相对缺乏的事实。因此,新时代文艺批评(包括当代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网络文艺批评、影视批评等等)的重要价值向度,就不只是挖掘作品中的创造性的、美的因素,发挥审美教育的话语功能,更重要的还是要强化文艺批评的褒贬甄别功能,以艺术的、美学的观点作为创作与评价标准,对文艺作品中出现的低俗、浅薄、浮躁的低层次审美和低层次创新现象进行批评,引导文艺创作者树立精品意识、经典意识,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提炼和再创造,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超过前人的想象。国家和社会的实践创新,是文艺创造力的最大来源。新时代文艺批评应以促进社会的价值构建作为重要使命,发挥自身的话语力量。新时代文艺批评的话语力量,归根到底来源于对现实文化生态的深刻理解,对现实问题和时代问题的敏感捕捉与回应,以及在批评实践中对自身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创新。

注释[Notes]

- ① 参见高建平:“论学院批评的价值和存在问题”,《中国文学批评》1(2015):9。
- ② 对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和媒体批评这三者的区分,见蒋述卓:“批评的专业化与批评的品格——兼论文学批评与学术机制的关系”,《文艺理论研究》5(2003):22。
- ③ 参见余虹:“理论过剩与现代思想的命运”,《文艺研究》11(2015):11—17。此文从西方现代进程中的思想的反思批判出发,揭示出“理论过剩乃是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想症候”。
- ④ 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对国内学者颇具启示意义。此文最早收录在200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探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如何开创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后来收录在王晓明主编的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四卷即为《批评空间的开创》。
- ⑤ 美国艾布拉姆斯从学科自律的角度,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文艺谈话,无法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的美学标准(参见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但从广义意义上,我们认为《理想国》可以看成是文艺批评最初的形态,因为里面较早涉及到对戏剧诗及相关艺术问题的评价与讨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 [Hong, Zicheng. *Problems and Methods: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5.]
- 蒋述卓:“当代文艺评论应自觉与文化传统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中国文艺评论》10(2017):11—14。
- [Jiang, Shuzhuo.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Should Consciously Establish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with Cultural Tradition.” *China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10(2017): 11—14.]

-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 [Liu, Mengxi, ed.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lassics: Volume of Hu Shi*.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Liu, Xi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The Birth of Tragedy: Aesthetics Writings of Nietzsche*. Trans. Zhou Guo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张岱年等编。河南:大象出版社,1999年。
- [Qian, Xuantong. “The Issue of China's Written Words from Now on.” *Read Backwards for a Century: The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Deb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Vol. 2. Eds. Zhang Dainian, et al.. Henan: Elephant Publishing House, 1999.]
-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 [Xi, Jinping.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s Daily* 28 Oct. 2017.]
-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 [——.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 Work.” *People's Daily* 15 Oct. 2015.]
-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
- [——.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and the 9th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eople's Daily* 1 Dec. 2016.]
- 张燕婴:《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Zhang, Yanying. *Confucian Analects: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责任编辑:赵勇)